

隔離簡史： 沉默年代的無聲黑白

The Brief History of Isolation:
The Black and White Movie in the Silent Era

馮磊 Lei Feng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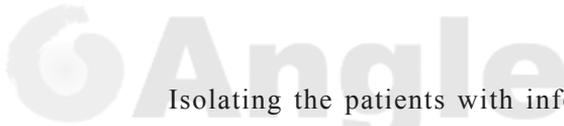
摘要

隔離傳染病患者是人類面對瘟疫災難時的基本舉措。在西方歷史中，基督教的出現使隔離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放逐的意義。十三世紀以後，世俗的行政力量逐漸成為隔離的主要管控者，現代隔離檢疫制度就此確立。隨著醫學科學的發展，接觸感染理論被證明，隔離制度也獲得了科學意義上的解釋。在中國歷史中，隔離肇始於秦漢時期，發展於西晉時期，繁盛於兩宋時期。1910~1911年的東北鼠疫大流行中，伍連德組織了以隔離檢疫為基礎的抗擊疫情行動，成效顯著。在Foucault看來，隔離的運行可能是現代社會權力規訓和權力網路化的早期演練，而隔離產生的歧視影響也應引起足夠的警惕。以史鑑今，未來的疫病隔離制度應更具科學和文明之屬性。

*重慶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法學博士，中國衛生法學會常務理事（Vice Dean, College of Maxism,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Professor, Doctor of Law; Standing Director, Chinese Health Law Society

關鍵詞：傳染病（infectious diseases）、隔離（isolation）、檢疫（quarantine）、醫學史（medical history）

DOI：10.3966/241553062020040042010



Isolating the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diseases is an instinctive reaction of human being to the plague. In western histor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Christianity, isolation had been largely changed from the meaning of exile. After the 13th century, the secular administrative force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 controller of isolation, and the modern quarantine isolation system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ce, the theory of contact infection had been proved and the isolation had been scientifically explained. In Chinese history, isolation bega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developed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two Song dynasties. During the northeast plague pandemic of 1910-1911, Dr. Wu-liande had organized an anti-epidemic campaign based on quarantine isolation system, and the action had produc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Foucault's view, the operation of the isolation may be an early exercise of discipline and power network in modern society. The discriminatory effects of the isolation should also be sufficiently alarming.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quarantine isolation system should be more scientific and civilized in the future.

遠離災難是人類的本能。西元前430年夏天，入侵阿提卡（Attiki）地區的伯羅奔尼薩斯人，如入無人之境，逼近目標雅典城，但他們在沿途奇怪地發現，很多雅典人一邊驚慌失措地逃離城邦，一邊不斷在路邊埋葬死者。於是，伯羅奔尼薩斯人便向來自雅典城的逃難者打聽是怎麼回事，驚魂未定的逃難者將城裡瘟疫肆虐的事情告訴了入侵者，兇悍的伯羅奔尼薩斯軍隊迅速調轉方向匆匆撤離而去。飽受瘟疫摧殘的雅典就此逃



過戰火蹂躪，也算不幸中的萬幸¹。

面對惡疾，出於恐懼，也出於自保，人類很早就以隔離的方式予以處理。隔離的早期形態其實是放逐，在古代波斯，不僅罹患惡疾的人不得入城，連與患者接觸的動物也要被趕走。在古代希臘，放逐甚至獲得了哲學意義上的解釋：在古希臘人看來，理想的人是和諧的存在，肉體和靈魂完美平衡，高貴優雅，而惡疾打破了平衡，使一個人變成了劣等的存在。因此，在希臘的醫師看來，為毫無希望的患者看病是缺乏職業道德的，尤其是在該疾病具備傳播可能時，對被上天放棄的劣等人實施放逐，是符合理性的最優選擇。

基督教的出現改變了放逐的懲戒意義，使之漸漸變為隔離。在基督教的理論中，被逐出人類社會正常機體的患者仍然會獲得寬宥和拯救。能夠追溯到的最早完整記載隔離的文獻，是成書於西元前570年之前的《舊約全書·利未記》，其中第13章詳細記錄了對麻風病（漢生病，Leprosy）患者進行隔離的程序：「1.耶和華曉諭摩西、亞倫說：2.人的肉皮上若長了癬子，或長了癬，或長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風的災病，就要將他帶到祭司亞倫或亞倫作祭司的一個子孫面前。3.祭司要察看肉皮上的災病，若災病處的毛已經變白，災病的現象深於肉上的皮，這便是大麻風的災病。祭司要察看他，定他為不潔淨。4.若火斑在他肉皮上是白的，現象不深於皮，其上的毛也沒有變白，祭司就要將有災病的人關鎖七天。5.第七天，祭司要察看他，若看災病止住了，沒有在皮上發散，祭司還要將他關鎖七天。」

在基督教教義的感召下，中世紀早期的歐洲，醫師對罹患惡疾、可能會被隔離的患者，要經過反覆的檢查才能確診。醫師被叮囑務必要小心翼翼，不能輕率判斷。而且，在患者確診

1 王旭東、孟慶龍，世界瘟疫史，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6月，214頁

之後，醫師要向患者解釋：「儘管疾病可能意味著背離了基督徒純潔的生活，但基督從未看不起罹患惡疾的人，也從未放棄拯救他們的靈魂。」在一些地方，被終生隔離之前，教會還會為患者舉行一場安魂彌撒，從此，他將被所處的社會宣布死亡，但在教會的隔離場所內繼續生存。正如基督教的作家們所誇耀的，基督徒在瘟疫前往往互相扶持，只有異教徒才會冷酷地拋棄病人。生活在西元251年的迦太基主教Cyprian甚至歌頌當時的瘟疫：「這場瘟疫儘管看起來恐怖而致命，然而卻彰顯了正義，測試了人類的靈魂，因此瘟疫的爆發是多麼適宜而又必要啊……²。」

在整個中世紀，教會成為收容和隔離麻風病人的主要力量。在西元六世紀的拜占庭、七世紀的法國凡爾登等地、八世紀的德國聖奧特瑪、法國科爾比斯等地、十世紀的英格蘭、十一世紀的西班牙，均有教會管理的隔離寓所。在英格蘭和蘇格蘭，隔離寓所由看守者、教長、修道院院長控制，對患者予以禁錮，嚴格禁止其外出。在十三世紀，僅麻風病院在所有基督教國家中達19000座之多。教會的工作也推動了世俗社會的立法。倫巴第羅薩爾國王（King Rothair）（西元七世紀）、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西元757年）、法蘭克國王查理曼（Charlemagne）（西元789年）均頒布了麻風病人禁止結婚、應予以隔離的強制性法令，並交由教會予以執行³。

儘管如此，被隔離的人仍然被整個社會所警惕，甚至被殘害。英國醫學史學者Roberto Margotta就認為，除通過隔離切斷傳播的可能性之外，麻風病消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瘟疫攜帶者」身分為患者帶來的殺身滅頂之災：「人們憑空想像

2 William H. McNeill著，餘新忠、畢會成譯，瘟疫與人，中國環境科學，2010年4月，73頁。

3 王旭東、孟慶龍，同註1，134頁



他們是魔鬼的助手，在歐洲許多地方，尤其是在瑞士和阿爾薩斯，瘟疫中倖存下來的麻風病人，會與猶太人一起遭到屠殺⁴。」因此，雖然來自基督教的讚美詩裡仍然充滿著溫情：「你不必害怕黑夜的驚恐，或者白日的飛箭，也不必害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但事實是，充滿驚慌和恐懼的人群，已經將暴力作為鎮壓驚恐的唯一武器。

大約在十三世紀，主要用於隔離和救治麻風病人的醫院，逐漸從教會手中轉移到城市管理當局管控之下。來自宗教力量之外的現代隔離檢疫制度逐漸得以確認。在十四世紀鼠疫橫行之際，日益強大的政府替代教會成為控制疫情蔓延的主要力量。1377年，位於達爾馬提亞海岸的拉古薩城議會下令，該城衛生局人員對所有來自疫區的旅行者實施隔離扣留30天（*trentini giorni*）或延長扣留40天（*quaranti giorni*）不等的措施，防疫（*quarantine*）的概念就此產生。1380年，威尼斯也採取了同樣制度，威尼斯人將國外疫區旅客隔離在聖拉紮羅島30~40天不等。1383年，法國馬賽正式設立了海港檢疫站⁵。

行政隔離顯然比訴諸心靈和精神的宗教更富有強制力和執行力。「不會被埋葬在教堂裡」的威脅，總沒有剝奪財產或人身自由來得直接。1564年，飽受鼠疫困擾的倫敦市政廳下令，任何市民，只要家裡有人感染了鼠疫，其妻子、孩子與所有的成員都不可外出，門窗都要關閉，在房屋裡待滿40天。市政官將委託「誠實、謹慎的公民」，為他們提供食物、燃料和其他必需品。如果太窮無力而承擔，就由政府代為承擔。所有被隔離的人必須嚴格遵守規章，否則將被取消選舉權、送入監獄或終身失去在任何城市的活動權。

4 Roberto Margotta著，李城譯，醫學的歷史，希望，2004年3月，67頁。

5 Henry E. Sigerist著，秦傳安譯，疾病的文化史，中央編譯，2009年12月，83頁。